

雖千萬人吾往矣

蔣碩傑書生報國

● 王成聖

財經專家普羅代表

經濟學家蔣碩傑（一九一八—一九九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董事長，曾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康乃爾大學及台灣大學執教。回國後，曾擔任行政院經濟顧問、賦稅改革委員會委員。他在台灣對財經的學畫和建言，最值得尊敬和懷念的是，他的主張一直站在普羅大眾方面，作平民階級的代言人。

蔣碩傑為湖北應城人，一九一八年出生在上海，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為民國初年的外交家，曾任駐日大使，就是鼎鼎大名的蔣作賓。共有兄弟六人，蔣碩傑是最小的兒子，年齡三、四歲時，他的父親即延師啟蒙，請了一位摩登女老師朱子秋，是留日回國的學生，使他早就留下對日本國情的印象。

蔣碩傑八歲時在上海入小學讀書，進的是他的姨母革命元勳邵元冲夫人張默君所辦

的神州女學的小學部，校中的學生以女生居多，經常逗他玩，使他書也唸不好，所以他中小學時代功課並不出色。九歲搬到北平，在北平只唸了一年小學，又回到上海，考進法租界的南洋中學補習科，即附屬小學，補習科唸了六年，即算到了初一，升入南洋中學，南洋中學是五年制，畢業後，蔣碩傑未進入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系，九一八事變後，目睹日本的非常時代，即武裝軍人到處襲擊，主張和平的政治家犬養毅就是在少壯軍人找他談判時，意見談不攏，被當場砍殺。不久，爆發了「二二六事件」，有將近一個師團的軍人成群結隊的去殺害他們認為膽小誤國之人。蔣碩傑看到這些覺得日本人十分悲哀又可憎。

博士論文譽滿英倫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蔣碩傑為愛國心驅使，棄學離日返國，投身抗戰救國行列。

一九三八年轉赴英國留學，進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一九四一年獲學士學位，那時戰火熾烈，蔣碩傑本想回國卻買不到船票、機票，只好留在英國。而二次世界大戰正酣，英國也是遍地狼煙，他親見英國在通貨膨脹激烈下，投機者「五鬼搬運法」的斂財術。自那時起，他對五鬼搬運法就深惡痛絕。一九四五年，他在敦倫政治經濟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並以最佳博士論文獲該學院的「赫其森銀牌獎」。

完成學業後，歐戰已近尾聲，他經印度加爾各答飛到昆明再轉重慶，到達重慶時，抗戰即告勝利，日本投降，他再由重慶轉赴北平，原計劃到北京大學執教，這是在回國前即已答應的約定。但是他到達北平後，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正忙著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的復校工作，尙待分配教授，這時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公權邀蔣碩傑去東北，整理東北地區的經濟，他遂出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調查研究處處長。任

內見識到俄軍凶惡的掠奪和中共的詭計破壞。後來，東北局勢惡化，蔣碩傑轉赴北平，應北大校長胡適之聘到北大教書，並先後在燕京和南開大學兼課，在北平，他結識自美國回國的劉大中博士結成好友。一九四八年華北吃緊，蔣碩傑來台，任教於台灣大學。

當時，台大剛自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一切因陋就簡，教授連個辦公桌都沒有，想做點研究也沒辦法，蔣碩傑認為不能在台大久待，於是申請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居然不到五個月就成功了，於是他轉往日內瓦就職。所以他在台大只教了一個學期。

外匯論受知尹仲容

在國際貨幣基金會工作滿三年，有機會休假，蔣碩傑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次回國前，認識了國府駐美技術團副主任李榦（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駐美大使館商務參事、中央銀行副總裁），李氏寫了封介紹信給當時的經濟部長尹仲容，要他回國後一定要去看尹仲容，他抵台後，便去看尹仲容，由於尹仲容是學電機的，不懂經濟，兩人談話很不投機，辭去時，他送了James Meade 著的一本書「計畫與價格機能」(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給尹仲容。這本書給尹仲容的影響很大，使尹仲容知道「價格機能」對經濟的影響。可是蔣碩傑在國內兩星期就回美國了。不久，行政院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尹仲容特別找蔣碩傑回來，任專任委員

，從此展開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一九五四年，蔣碩傑結束了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應蔣經國之聘擔任行政院經濟顧問。

蔣碩傑和尹仲容正式接觸，是在他回國休假一年多以後，就是在一九五四年初，尹仲容給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中國理事譚伯羽寫了一封信，要譚伯羽和基金會方面商量，借調蔣碩傑和劉大中回國在貿易和外匯上做些研究，因為那時台灣的貿易和外匯正遭逢大困難，外匯儲備差不多已花光了。做國際貿易，係由一般銀行發信用狀給外國銀行，比如說擔保某位商人可以在當地支用五十萬美元的額度，那邊銀行看了這張信用狀，相信既然有銀行這樣子擔保他們，應該沒問題了，那個商人來了之後就可以讓他支到五十萬的額度。可是那時連臺灣銀行發出去的信用狀，外國銀行都不肯接受，因為臺灣銀行自己沒有多少存款在外國，人家怕臺灣銀行付不出來。

窮到那種程度尹仲容不想個辦法，中國政府就去請美國幫忙，那時候美援已經開始，所以肯幫忙，就答應派一個經濟顧問來，團長是Mr. Stevens，是個銀行家，並不是研究經濟學的。

主張制定單一匯率

尹仲容要劉大中和蔣碩傑兩人陪著這個顧問團去研究研究臺灣的對策，他們要資料時，幫他們找。不過他們看這個顧問團也不

怎麼高明，大多數是銀行家，有兩個是學者但不很出名，是二、三流的人才。蔣碩傑跟劉大中就決定自己寫一個報告。在臺灣待了兩、三個月，美國顧問寫出一份報告，他們也寫了一份報告，分別交上去。顧問團的報告很平凡，因為帶頭的團長是銀行家出身。臺灣外匯有點問題，他就主張貶值一點點，怎麼算出來的沒有人知道，反正很小；其他的建議也普普通通，比方說預算要平衡一點，沒什麼特別的。

那時候他倆覺得匯率跟均衡匯率差很遠。不但如此，對於不同的出口也有不同的匯率。譬如某種出口品如果競爭力較大，就認為這個物品的匯率可以經得起比較高（比較不利、即較低的兌換美金比率）的匯率；另外一些產品如果認為它的競爭力很低，就給它較低的有利的匯率，讓它好競爭。所以訂出來很多匯率，制訂的人大概自以為非常聰明。其實用心想想，這是很不聰明的事情。為什麼呢？比方說有個弱勢商品就給它有利一點的匯率，這不是鼓勵這種沒有競爭性的商品生產嗎？另一個商品是競爭力很大的，而說它就可以經得起一個不利的匯率，但是它能競爭為什麼不讓它盡其可能去競爭呢？仔細想想這是不公平呢？它因為能夠競爭就得到一個比較不利的匯率，這不是故意歧視有競爭力的商品嗎？

蔣碩傑和劉大中建議先制定單一匯率，這樣子對各種工業才能產生公平，沒有差別

待遇，可以用匯率挑選那些商品值得生產，而且在臺灣是真是有競爭力的。在這樣的制度下，有競爭力的產業就能夠取得它的地位，愈是競爭力大的，所佔資源比例就愈大；而沒有競爭力的產業自然就會變小，會萎縮下去。這樣萎縮下去是應該的，因為它競爭力小，我們不應該把國家有限的資源配置太多到那裏去生產。

自由市場決定幣值

除採行單一匯率之外，貨幣如果要貶值，則統統用同一個比例貶值，到底貶多少，憑空也推想不出來，最好用自由市場來決定，由價格機能決定。不過在那時候，讓價格機能自由決定的話，有個大危險，因為那時候大家對臺灣沒有信心，要是統統可以自由買外匯的話，說不定有人根本就逃到臺灣，把錢帶到美國去做寓公去了！他們把這些資產都帶出去怎麼辦？或者做生意的人、出口商，他們出口賺的錢都想拿到美國去存起來，怎麼辦？所以蔣碩傑、劉大中覺得准許自由地買賣外匯恐怕不太妥當。於是就想出一個辦法，無論什麼人，反正賺到外匯，得先把外匯交給政府，你不能說是我賺的錢，我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我要帶到美國去，就帶到美國去，這樣的話，所有出口的東西大部分都沒有著落。他們覺得要先讓商人賺的錢都交給政府，政府給商人外匯券，證明他賺了錢，比方一百萬美金，而這一百萬美金

還是由商人來花，由商人來支配，可是政府要限定使用方法，而且訂了幾種准許的進口品，如果是自己生產所需用的原料或機器，那不成問題，馬上就准。

蔣碩傑和劉大中的單一匯率建議於一九五四年提出，直到一九五八年尹仲容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才開始實施。因為起初當時的財政部長徐柏園反對這個辦法，徐以為他訂出來的複式匯率都是最合理的匯率，各種商品不同，都是按其賺錢能力而訂的。

當時流行的學說是匯率（以新臺幣表示的外匯價格）應儘可能把它壓低，這樣可以使國內的物價低一點。理由是匯率低的話，進口貨就便宜，匯率高的話，進口貨就貴，有成本推動的危險。這種說法完全不通，蔣碩傑曾據理力駁，說匯率訂得低，進口貨的價錢就低，這話蔣碩傑認為是不對的。匯率訂得低，出口貨賣不掉，根本賺不到外匯。

改革匯率影響重大

匯率改革是蔣碩傑和劉大中回台後所做的一件大事，可是他兩人的建議，只有尹仲容懂得，而尹氏僅為經濟部長，匯率要財政部決定，財政部長徐柏園完全不理這一套，只好擱置。直到一九五八年，陳誠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重用尹仲容，尹的權位加重，才以外匯貿易管理委員會主委的身分，採納了這個建議，對台灣的外貿起了很大的作用，

台灣經濟起飛，也由此振翅高翔，就在這一年，蔣碩傑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台期間，蔣碩傑佩服在台糖做事的邢慕實，看過邢寫的一篇講福利效果的文章，文中提到邊際效用和邊際成本的問題，見解獨到，使他一讀傾心。邢氏為芝加哥學派的學人，所以不同於當時流行的凱因斯理論，凱因斯理論不講福利和最適用，只講有效需求不夠。懂凱因斯的人自以為學了新的經濟學，結果把老而實用的東西丟掉了。這是蔣碩傑深為詬病的，很不以為然。

蔣碩傑於一九六〇年起任教於美國羅徹斯特大學，一九六九年轉到康乃爾大學，直教到一九八五年退休。但他自擔任行政院顧問以後，每三年必回國一次，從事財經方案研究。一九八〇年，國府為了研究大陸中共經濟，籌備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由蔣碩傑任籌備主任，一九八一年正式成立時，出任首任院長，一九九〇年轉任該院董事長，一九九三年因健康不佳而辭職，不料於十月二十一日病逝美國，享年七十六歲。

培植後進鼓吹理念

蔣碩傑頭腦敏慧，青年時代很會讀書，早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班二年級時即嶄露頭角，在完成博士論文前即有三篇論文發表於英倫著名的學術刊物上：一為批評凱因斯關於人口成長和經濟成長的論文；二為批評凱因斯學派健將卡爾多關於股票投機與所

得水準間關係的論文；三為指出庇古在《就業與均衡》書中一項錯誤的論文。

蔣王論戰震驚學界

蔣碩傑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寫成，並刊於著名的學術刊物上，身後存有四十餘篇。他主要的貢獻乃在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方面。在他還是研究生時，即發現凱因斯的投機性貨幣需求理論，只是短期金融資產和長期債券之間投機性套利理論。隨後又於一九五六年指出凱因斯在一九三七年承認自己忽略了「融資性的貨幣需求」的自白，也暴露了自己的流動性偏好理論的邏輯上缺失；一九八〇年蔣碩傑又重新申論羅伯森之可貸資金理論，並指出流量分析優於凱因斯之流動性偏好理論存量分析之理由，而且也順便闡述晚近弗利曼持以批評凱因斯之貨幣理論，反不如羅伯森理論之合理。

蔣碩傑在台灣不會長住，但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他經常往來於美台兩地，除備政府財經諮詢而外，還關心教育，經常邀國際知名學者來台講學，協助台大設置經濟學博士班，對培植後進不遺餘力。他一本其一貫的自由市場理念，站在平民大眾立場，鼓吹他的經濟理念。在台期間，他以中文撰文，導正一般人的觀念，結果和國內的經濟學者王作榮展開了一場筆桿上的「蔣王大戰」，不但引起經濟學界的矚目，一般民眾也嘖嘖好奇，由閱讀兩人的文章

中對經濟理念和經濟政策有了若干概念。

在「蔣王論戰」中，蔣碩傑用通俗易懂的「五鬼搬運法」、「金蟬脫殼法」，對經濟學缺乏基本認識的社會大眾，上了寶貴的一課。他讓社會大眾了解到本身多年辛苦累積的財富，如何在不當的經濟政策之下，透過低利率與通貨膨脹，而被少數人士以巧妙的手段「搬走」而不自知；以及少數人士如何藉由購買國外資產及匯率貶值，而輕鬆償還所積欠的債務，並同時留下鉅額的財富。

蔣碩傑並不僅僅是倚仗本人多年學術研究所累積的「大智」，更具備「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大勇」他的言行，已不僅僅侷限於「書生報國」的傳統格局，更展現出扶弱抑強之仁者情懷，當然也使得他在早已享有國際盛名之餘，又在國內社會大眾心目中贏

得高度的崇敬。

堅守學術絕不做官

最值得推崇的是他耿介風骨。以他備受國內、外尊重之學識與才具，卻始終堅守學術研究崗位；僅對政府提供建言，從未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而當時政策有所偏失時，則毫不猶豫地提出諫諍。在政府官員中，有很多是他的同學，是他的老友，他從未利用這種關係，要求什麼名分，什麼待遇。甚至當他的老朋友官位高陞後，他反而同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這方面，他很知分寸。

同時，他批評經濟政策時也從不因同學或朋友的關係，而放棄批評，轉為支持。像這種有風骨的人，在現實社會中早已是鳳毛麟角了。

編輯報告

編者

△春節將屆，在此先向「中外讀者」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本誌三六九期第一四二頁中欄第十四行「一九七九年蔣中正總統提名……」應為「一九七九年蔣經國總統提名……」。特此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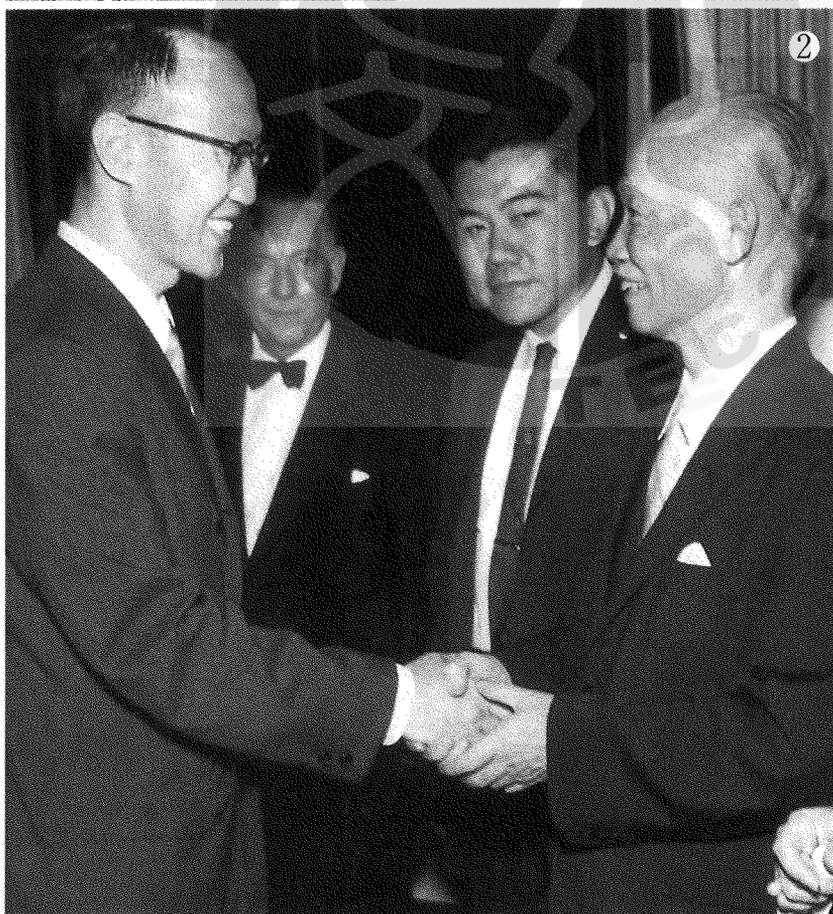
△三七〇期第十三頁中欄倒數第五行「方『與』紀要」應改為「方『興』紀要」。

△三七〇期第七十三頁上欄第五行應為「黃通，字更夫」。倒數第三行第六字起應為「在南京市選區當選之立法委員……」。第七十六頁下欄第八、九兩行所寫的「唐振楚及陳水逢應係中央委員會之副秘書長。」特此更正，並請讀者鑒諒。

王成聖：「蔣碩傑書生報國」插圖（文見1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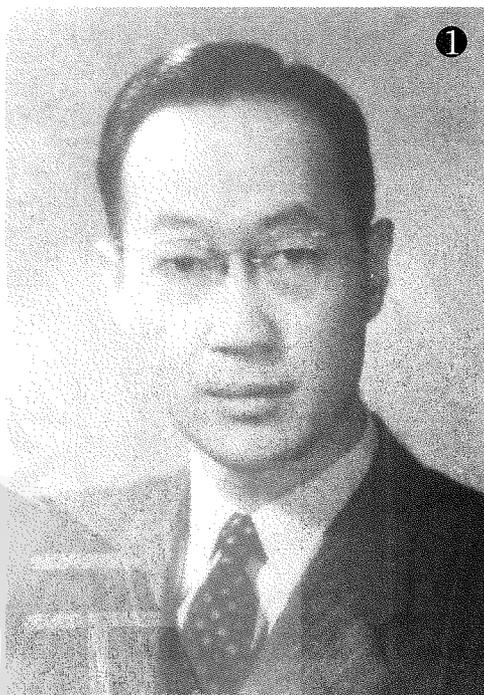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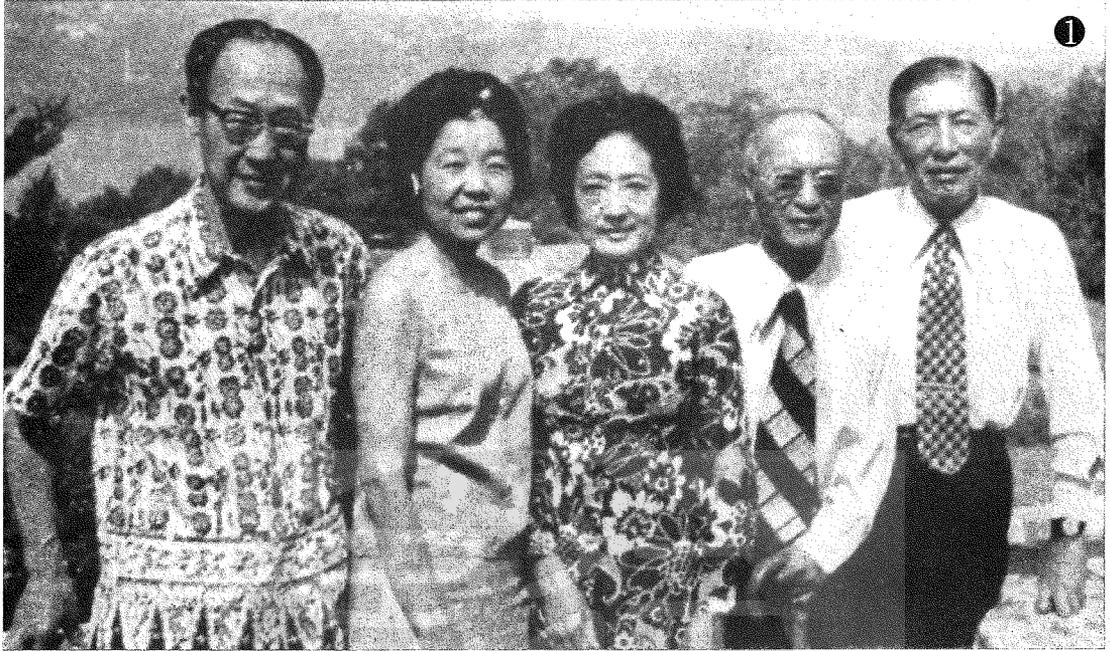
②

① 蔣碩傑（左二）偕夫人馬熙靜（右二）與長女蔣人和（右一）次女蔣人雋（右三）叁女蔣人瑞（左一）合影。
② 蔣碩傑（左）一九六一年與陳誠副總統（右一）在華府雙橡園的酒會上握手晤談時留影。



王成聖「蔣碩傑書生報國」插圖（文見23頁）

- ① 蔣碩傑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大學留影。
- ② 蔣碩傑一九九二年在中華經濟研究院留影。
- ③ 蔣碩傑（右）與王世杰（中）劉大中（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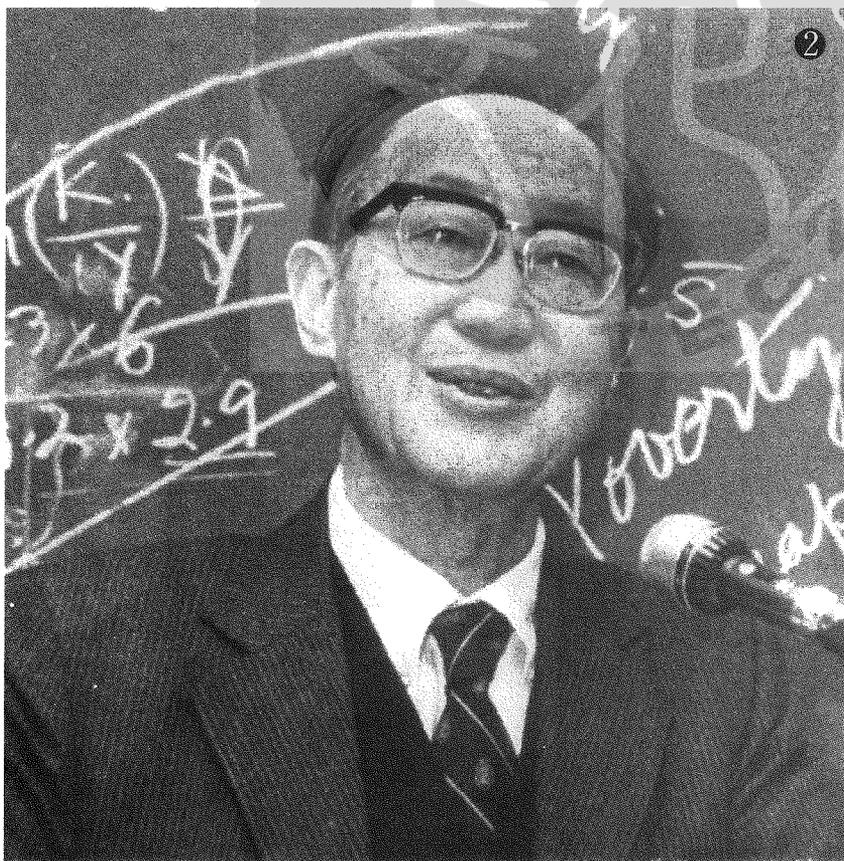
① 蔣碩傑夫婦（左一、二）與劉大中夫婦（右二、三）、李國鼎（右）合影。
② 右起：蔣碩傑、李國鼎、劉大中、葛倫森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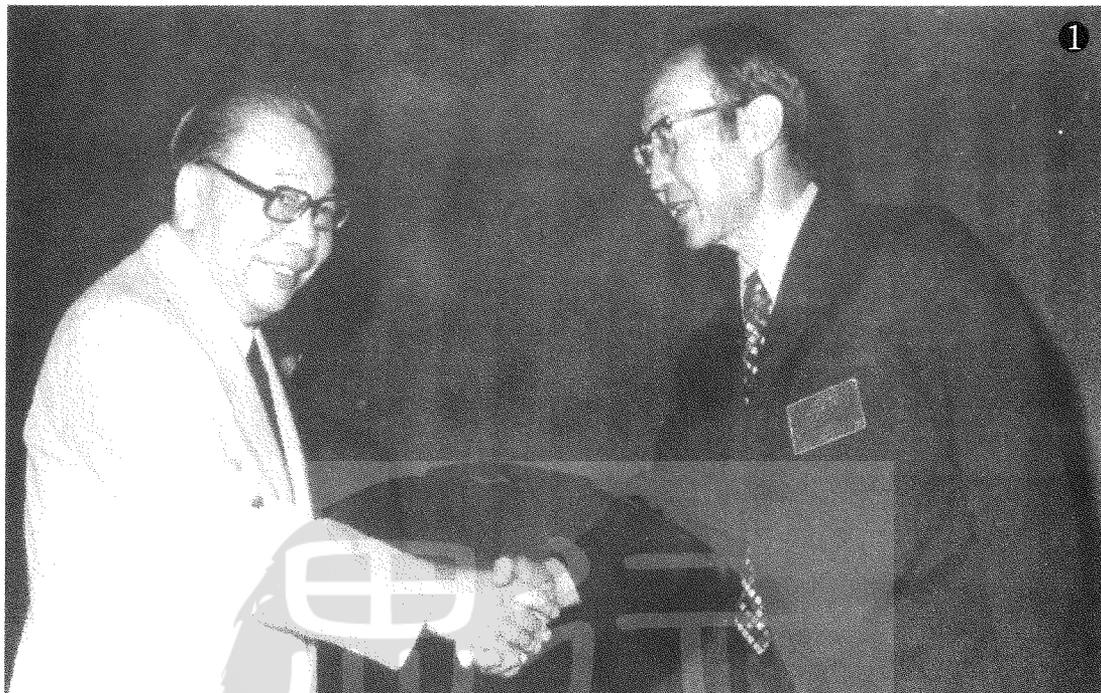
①



②



① 蔣碩傑（左一）偕夫人（左二）一九八二年與 Dr. Hayek 夫婦（右一、右二）在西柏林合影。
② 蔣碩傑一九八四年演講「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時的神情。



① 蔣碩傑（右）與蔣經國（左）晤談時留影。

② 蔣碩傑（右）與李國鼎（左二）、辜振甫（左）、李艷秋（右二）座談時留影。

